

清代山東刻書史 (下)

唐桂艷 著

儒家文明協同創新中心資助項目
儒學與山左學術叢書之四

齊魯書社

清代山東刻書史（下）

唐桂艷 著

儒家文明協同創新中心資助項目
儒學與山左學術叢書之四

齊魯書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清代山東刻書史 / 唐桂艷著. — 濟南: 齊魯書社,
2016. 12

ISBN 978-7-5333-3490-1

I. ①清… II. ①唐… III. 刻書—圖書史—山東省—清代 IV. ①G256.2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6)第 124548 號

封面題簽: 劉曉東

責任編輯: 張 超

版式設計: 李 生 郭 覲

清代山東刻書史

唐桂艷 著

主管單位 山東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發行 齊魯書社

社 址 濟南市英雄山路 189 號

郵 編 250002

網 址 www.qlss.com.cn

電子郵箱 qilupress@126.com

營銷中心 (0531)82098521 82098519

印 刷 山東德州新華印務有限責任公司

開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張 64.75

插 頁 32

字 數 1741 千

版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數 1 - 1000

標準書號 ISBN 978 - 7 - 5333 - 3490 - 1

定 價 280.00 圓(全三冊)

第四章 清後期（同治至宣統）山東刻書

第一節 清後期山東刻書概述

一、清後期的社會經濟狀況

在與英法聯軍簽訂屈辱的《北京條約》後不久，同治帝即位。同治三年，清軍攻占南京，太平天國失敗。之後一直到義和團興起和八國聯軍入侵北京，在相對平穩的一段時期內，兩宮太后垂簾聽政、議政王奕訢主持政務，互相配合，推行新政，形成了“同治中興”的局面。其主要措施是：成立總理衙門、設立同文館、辦新式學校、派人出洋、開工廠開礦、修築鐵路等，實行學習西方近代化的舉措，開始走向開放、進步。其代表人物除了奕訢，還有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等。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在上海、南京、福州相繼辦起了近代軍工廠，多聘請洋員充當技術指導，這就是所謂的“洋務運動”，它包括舉辦新式軍用工業，編練新式軍隊，加強國防建設等，其宗旨是“自強”與“求富”。

光緒前期，中國政局相對平穩。光緒九年至十一年的中法戰爭，光緒二十年的甲午戰爭，均以中國失敗而告終。二十四年，光緒帝啓用康有爲、梁啟超等進行“戊戌變法”，但受到以慈禧太后爲首的保守派的反對。光緒帝被慈禧幽禁在頤和園。整個維新不

過歷時一百零三天，故稱“百日維新”。

光緒二十六年，庚子事變，義和團興起，八國聯軍趁機占領北京。之後，各地反清武裝起義此起彼伏，民主革命思潮在全國廣泛傳播。雖然在光緒二十七年又實行“維新新政”，但無法挽救瀕於覆滅的清王朝。

在山東，兩次鴉片戰爭未造成直接的影響。捻軍在山東的影響也較晚。咸豐十年，捻軍進軍山東，僧格林沁、曾國藩先後在山東“剿捻”。一直到同治七年間，山東的捻軍與太平軍餘部結合，成為北方農民起義軍的主力，給清朝統治者以沉重打擊。

甲午戰爭中，日軍先在榮成登陸，繼之有威海衛之戰，山東成為戰場。隨後，德國借鉅野教案侵占膠州灣，英國強租威海衛，使山東這塊豐腴之地開始受到帝國主義者的覬覦。

義和團運動於光緒二十六年起於山東的東昌、曹州一帶，後逐步擴展至華北和東北數省，特別是在京津一帶，聲勢浩大，與國外侵略勢力展開了激烈的鬥爭。

第一次鴉片戰爭時，外國侵略勢力還沒有直接深入到山東，故對山東的經濟影響不大。但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後，煙台為對外通商口岸之一，同治元年一月正式對外開放，設立東海關。從此，外商及傳教士蜂擁而至。十幾個國家在煙台建立起領事館，煙台成為帝國主義進攻山東的橋頭堡。帝國主義的鴉片、工業品紛紛進入山東，而山東地區的土特產品也被掠賣出國。這樣，山東地區的社會經濟也開始捲入資本主義世界市場，成為帝國主義肆意掠奪的重點對象。外國經濟的入侵，不僅破壞了山東的自然經濟，而且把山東變成了帝國主義經濟的附庸。

清政府簽訂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不僅割地，還要賠款，加重了人民的經濟負擔。光緒二十七年舉辦各項“新政”，無一不需耗費巨額資金，原本就已匱乏的山東財政，此時更倍竭蹶。為了應付

急劇增加的各項財政支出，山東歷任巡撫及各級地方官府在推行“新政”期間莫不把“籌款”作為第一要務，致使攤派勒索層出不窮，各種稅捐無奇不有，下層人民生活困苦。

二、清後期的學術文化狀況

與動蕩的社會形勢不同，清代晚期的學術文化呈現一派新氣象，體現出鮮明的時代特色。王國維所謂“道咸以降之學新”，說的就是道咸以後由於西學的傳入，以及中學對西學的汲納，中國固有的學術發生了質的衍變，成了一種“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新學”。

鴉片戰爭後，由於政治、社會情勢的變化，乾嘉漢學已無法適應社會變化的需要。轉變學風、提倡入世致用已是勢在必行。在這一重大轉折時期，經世致用、救亡圖存成為晚清學術文化的基本原則。但傳統文化的救世、經世思想已陷於困頓之境，迫使經世派轉向西學尋求救助，從而使傳統文化走出了邁向西方的關鍵性一步。

中國對西學的接受，不僅是對西方科學技術的接受，還包括對社會制度、思想理論、價值觀念、思維方式等等一系列與資本主義相聯繫的文化思想的接受。洋務時期，建立近代的工廠礦山，成立翻譯出版西方科學技術書籍的機構，建立近代學校，均是對西方近代科學的傳播和運用。19世紀90年代以後，西方社會政治學說如進化論在近代中國開始傳播，使中國建立了社會科學各學科，實現了傳統學術的現代轉換。

在這一學術文化的歷史轉折時期，魏源首開其風，馮桂芬、嚴復繼之，至康有為、梁啟超、張之洞、章太炎而大昌。

近代中國資產階級新史學的開拓者梁啟超，在新史學的理論與方法兩方面都有獨到的建樹，代表性著作有《中國史敘論》和《新史學》。王國維也在新史學的建立上做出了貢獻。在史學方法論上，他主張用實證的、科學的方法來對待和研究歷史，並運用

這種方法，對中國古代文字、史事、史料進行考釋。

這一時期的文學是蛻變和開放的。詩歌上，黃遵憲以“我手寫我口”的《雜感》揭開了“詩界革命”的序幕，接着夏曾佑、譚嗣同、梁啟超、康有為、蔣智由、丘逢甲、丘煒菱等，以其“新派詩”開拓了近代詩的新視野、新意境、新天地，確立了新的審美規範。還有同光體的陳三立、沈曾植、范當世和中晚唐詩派的樊增祥、易順鼎，以及不名一派的李慈銘等，各具風采，各有建樹。此期被稱為“詞的中興光大的時代”，一時名家輩出，王鵬運、鄭文焯、朱孝臧、況周頤被稱為晚清四大詞人。晚清戲劇小說數量多。據阿英《晚清戲曲小說目》統計，創作小說四百六十二種，翻譯小說六百零八種。據莊一拂《古典戲曲存目彙考》統計，雜劇傳奇在五百種左右。小說方面，產生了被魯迅稱為清末四大譴責小說的《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老殘遊記》《孽海花》，其他小說如《兒女英雄傳》《三俠五義》《九命奇冤》《禽海石》《斷鴻零雁記》等均被譯成多種文字在國外出版。戲劇、彈詞、翻譯文學、文學評論，均有鮮明的時代特色。

郭延禮先生認為，中國近代文學“是在中西文化撞擊下所產生的具有新的文學觀念、新的創作主題、新的審美規範、新的藝術表現、新的傳播系統的一種開放型的文學”^①。

此種新氣象在山東卻無明顯體現。以教育為例，任銀陸《清末民初基督教在山東的傳播與山東的教育文化現代化》一文認為：“山東的國立新式教育肇始於1901年，此前，洋務運動時期以興辦訓練語文和技術為目的的學校為主的中國教育的早期現代化，在山東沒有什麼表現。至戊戌時期京師大學堂設立，各省選派學生咨送大學堂，經入學考試及格，入堂肄業，山東教育的現代化

^①郭延禮：《中國近代文學發展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頁。

方初露端倪。”^①所說當為“新政”後巡撫袁世凱在全國率先設立山東大學堂一事。可見，晚清的山東無論在學術、文化還是教育方面，都與全國轟轟烈烈的興盛之勢有一定的差距。這不能不影響到清代後期山東刻書的整體面貌。

三、清後期的山東刻書概況

（一）官刻

清後期的官刻書最大的特點是各地官書局的興起。官書局的成立，源於太平天國農民運動失敗以後，清代影響最大的武英殿刻書實際上已名存實亡，清政府為了重振儒學，“正人心”，“維世道”，由曾國藩宣導，始建江南書局。同治五年後，各省紛紛效法，浙江書局、湖北崇文書局、江蘇書局、湖南書局、四川書局、江西書局、直隸書局、廣東廣雅書局、淮南書局、山西書局、山東書局、安徽敷文書局、福州書局、貴州書局、雲南書局等陸續開設。

山東書局在同治九年由山東巡撫丁寶楨創辦，地址在濟南後宰門，直到光緒二十八年還在此地，民國十一年後遷址院西大街。光緒二十八年，山東書局由官家招商經營，改稱山東官書局，與山東官印書局、山東官印刷局、山東印書館無關，這些大概為純粹的印刷機構而非出版機構。山東書局與建立於同治八年、地址在馬跑泉街金線泉側的尚志書院，不是一個單位，但尚志堂是山東書局的編輯部。山東書局的書大多由尚志書院的師生們校勘董理，故二者關係非同一般。

作為清後期山東最大的官方出版機構，山東書局共刻書四十二種，加上子目達七十餘種。當然，與其他書局還有一定的差距，如當時的廣雅書局刻書達三百種，浙江書局、湖北崇文書局、江蘇

^①任銀陸：《清末民初基督教在山東的傳播與山東的教育文化現代化》，載《聊城大學學報》2002年第2期。

官書局刻書均在二百種左右。在全國近二十個官書局中，山東書局的刻書數量處於中等位置。

作為官方的出版機構，官書局把重興儒教作為書局的刻書宗旨，故所刻書籍，大都是傳統的國學著作，以覆刻翻印清內府、武英殿刻本為多。同時，輯刻地方著名學者的書籍，顯現地方特色。在晚清複雜的歷史背景下，官書局刻書又呈現出時代特色，適應時代的需求，刊刻了大量公文，如條約、章程等，以及翻譯的西書，尤其是有關日本的書籍和教育書籍。各省官書局刻書各有特色：金陵官書局刻書精校勘，由張文虎校訂的《史記》為最善之本；浙江官書局所刻《二十二子》皆以各家校刊及明世德堂本為依據，是子書叢刻中的最善之本；湖北官書局刻書側重實用，但校勘不夠精審；湖南官書局側重選刻近人著作；江西官書局主要是重刻《武英殿聚珍版叢書》；廣雅書局所刻皆為大部頭著作，如《廣雅叢書》《武英殿聚珍版叢書》《全唐文》等。

山東書局刻書在內容上，經、史、子、集，無所不包。如經部書有《十三經讀本》《孔叢伯說經五稟》《通德遺書所見錄》《御注孝經》《孟子要略》《小學韻語》《小學集注》等；史部有《通鑑綱目四編合刻》《山東軍興紀略》《籌濟編》及各國章程等，還有士子必備書目；子部書最多，有被視為地方官必備指南的《龍莊遺書》，有法家類《洗冤錄詳義》，有農家類《農政全書》，有儒家類《二十四孝弟詩輯注》《勸學篇》《尊宗贅議》，還有醫家類《驗方新編》《世補齋醫書》《慎疾芻言》。相對來說，集部書較少，僅有《蒿庵集》《敬亭集》《止止堂集》數種，與私家刻書集部占主體大相徑庭。

翻刻內府本是山東書局刻書的重要內容，有《籌濟編》《小學集注》《勸學篇》《聖諭廣訓衍說》《御注孝經》等。還有重刻清代版本，如《孟子要略》仿刻漢陽劉氏槧本；《洗冤錄詳義》所據為古均閣許氏刻本；《續山東考古錄》雖有葉圭綬咸豐元年濟南刻本，

但當時版已不存，山東書局重刻之；《農政全書》所據為道光十七年貴州糧署刻本；《蒿庵集》據乾隆三十八年胡德琳官濟陽時刻本重刻；《蒿庵閒話》據乾隆四十年李文藻潮陽郡齋刻本重刻；《敬亭集》據康熙間萊陽姜安節等刻本重刻；《慎疾芻言》為光緒元年烏程汪曰楨會稽學署刻本；《制服成誦編》《制服表》《喪服通釋》，雖有浙江、湖南、四川多個刻本，但在山東，山東書局此刻還是首次刊刻。山東書局在重刻時皆尊重原版版權，標明版本來源。

山東書局刻書關注地方文獻，即刊刻山東學者的著述，刊刻外地人所著有關山東的文獻。山東書局所刻的地方名人的著述有《蒿庵集》《敬亭集》《止止堂集》《孔叢伯說經五稟》《通德遺書所見錄》《戚少保年譜節要》《尊宗贅議》；刊刻外地人所著有關山東的著述有《山東州縣歌略並圖》《山東軍興紀略》《山東考古錄》《續山東考古錄》《重纂三遷志》。

山東書局刻書重版本，精校勘。如《止止堂集》的底本係據明萬曆刻本影鈔的鈔本，是現存唯一一個全本；《農政全書》的明刻本流傳不廣，以貴州本最為通行，山東書局據以重刻；山東書局所刻《倭文端公遺書》係在眾多版本的基礎上，收集資料最多的刻本。

山東書局所刻書被公認為校勘精審的本子有《十三經讀本》附《校勘記》和《資治通鑑綱目四編合刻》附《校勘記》。阮元刻本優於《十三經注疏》其他版本之處在於其有《校勘記》，山東書局《十三經讀本》亦有校勘記，故為善本。曾國荃奏開山西書局，刊《四書》《六經》，因其地覓不到善本，即仿山東書局此本。山東書局所刻第二部大書《資治通鑑綱目四編合刻》，以五本進行通校，一為趙府居敬堂初刻本，一為明嘉靖甲午江西按察司仿刻本，一為明萬曆庚子蘇府朱燮元重刻本，一為張朝珍摹刻本，一為清康熙戊子吏部侍郎宋犖奉旨校刊陳仁錫本。山東書局此本集各編之長，

增加了《地理續考》，並附《校勘記》，為前述諸本所無。

山東書局所刻《經籍要略》，稱得上是一部具有學術價值的士子讀書目錄。注明版本和著者籍貫，並提供了很多版刻信息、著者信息、板藏地。

山東書局重底本、精校勘，得力於書局的學者型編輯，加之巡撫等要員的大力支持，故在保存與傳播文化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晚清山東官刻書位居第二的是尚志書院。尚志書院同治八年由巡撫丁寶楨創建。現已知尚志書院刻書有三十五種，分三種情況。署“尚志堂藏板”者有六種：《張楊園先生集》《省心錄》《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荒政輯要》《春秋大事表》《讀詩經音律》；在尚志堂校刊，實為個人所刻者八種：濰縣張昭潛刻《新雕徂徠石先生文集》，山陰陳錦刻《文廟從祀位次考》《有明於越三不朽圖贊》，樂安李氏刻《織齋文集》，榮成孫葆田刻《明文正氣集》《澤雅堂文集》，諸城尹彭壽刻《漢隸辨體》，巴縣潘清蔭刻《歷朝統系圖》；《尚志堂所刻書籍目錄》所言尚志堂刻本還有十八種：《蠶桑萃編》《格言聯璧》《胡文忠公遺集》《安瀾輯要》《痘疹定論》《公門果報錄》《經驗良方》《明刑管見錄》《牧令書節要》《佩文詩韻釋要》《勸善要言》《四庫書目序》《四書集註》《宋名臣言行錄前集後集別集外集》《正續小兒語》《直隸分道屬境歌略》《傳青主女科附產後編》《人譜》。

尚志書院的刻書內容與山東書局相似，更注重學術性，但沒有翻刻書。尚志書院的學子們也利用難得的人才資源，以個人名義刻印了部分有學術價值的著述。

清末實行新政，山東成立第一個官辦高等學校——山東大學堂，為了便於教學，刊印了不少課本，雖為新式教育，但所刻內容還以傳統國學為主。

所見山東大學堂出版物共八種，其中兩種為排印本，刻本有六種：《山東試辦大學堂暫行章程摺稿》《三通考序》《文獻通考紀要》《濟南大學堂備齋古文讀本》《國朝先正學規彙編》《山東高等學堂古文讀本續編》。全部為學生用課本，內容比較單一，刻書的目的很明確，就是為教學服務。

灤源書院在此期刻書有兩種。山東大學堂設址於灤源書院內，故灤源書院培養人才的使命宣告終結。

除了以上官書局、書院、大學堂刻書，清後期的山東官刻還有省級衙門刻書十七種和地方官衙刻書十種，孔府刻書一種。

巡撫刻書二種：《山東郡縣圖考》《山東曹州教案條約》附《膠澳租界圖》《膠濟鐵路章程》；布政司刻有：《賦役全書》，並兩次刊刻《山東交代章程彙編》；按察司刻書一種：《山東清訟章程》；學政刻書六種：《山左校士錄》《來賓聯詠》《山左校士錄四書文五經文》《學規舉隅》及兩次刊刻《聖諭廣訓》；都轉運司刻書三種：《重刻鹽法續增備考》《胡文忠公遺集》《慈觴文錄》；河防局刻書一種：《河神事蹟紀畧》；輿圖局刻書一種：《大清一統志輯要》。

地方官府刻書，有長清刻《五峰山志》，德州禮房刻《德州賓興事宜》，戴傑陵縣官署刻《小學人子禮》，榮成紀署刻《榮成紀略》，慶雲崔氏萊州府刻《釋惑錄》，臨清中學刻《奏定學堂章程》，青州府刻《青州府中學堂章程》，武威李於鏊刻《續資治通鑑紀事本末》，樂陵縣刻《地球三字經》，兗州府中學堂刻《讀史方輿紀要州域形勢編》。曲阜孔令貽刻有《聖門禮誌》《樂誌》。

由上可見，清後期的山東官刻書，數量上大幅增加，是前期、中期的總和。涉及的部門增多，更豐富多彩，除了常見的巡撫、布政司、按察司、鹽運司、學政刻書外，河防局、輿圖局都在各自的職責範圍內有刻書。地方官府涉及的地區也較為廣泛。最大的特點是官書局的刻書，不論是在內容上還是在數量上，都是清後期官刻書

的支柱。

（二）家刻

清後期的家刻共 626 種，數量上不及前期和中期，大概與三朝時間較短有關。每年的刻書種數在十二種，年刻書量比前期、中期要大。

本期最大的刻書家族是海豐吳氏。吳氏以刊刻家人著述為主。在家庭教育方面，吳自肅的《作文家法》曾六次刊刻。在弘揚家族精神方面，有《海豐吳氏文存》《海豐吳氏詩存》《吳氏世德錄》《海豐吳氏硃卷》《海豐吳氏試藝》五種。海豐吳氏尤關注山東地方文獻。如吳之勳刻明代戚繼光的《練兵實紀》《紀效新書》，吳重憲刊刻陳介祺的《家塾授蒙淺語》附《習字訣》，桂馥的《歷代石經略》《歷代石經大略》，時庸勳的《聲譜》《聲說》，許瀚的《攀古小廬雜著》。

吳氏所刻多為金石學名著，如桂馥的《歷代石經略》《歷代石經大略》，吳式芬的《攷古錄金文》《攷古錄》《金石彙目分編》，許瀚的《攀古小廬雜著》。這些傳世名著的刊刻，是清代山東金石學發展的見證。

吳重憲所刻《九金人集》極具版本價值。《潯南遺老王先生文集》的祖本為元本，又經吳焯校正，版本既古且精；《莊靖先生遺集》所據為僅存之正德本，連四庫館臣都未見過，版本稀見；《蕭閑老人明秀集注》所據為影金鈔本，而現存金刻本祇一部；《天籟集》以楊本為底本，校以錢塘丁氏鈔本，是此書現存的最好版本；《二妙集》為此書的最全本。吳重憲所刻書不僅具有版本價值，而且有名家如繆荃孫、許瀚、丁艮善等協助校勘，具有較高的學術性。

海豐吳氏刻書大多刻印精美。版心有字數，有時版心下刻字數並句數，較為特殊。版框外有書耳，記每葉字數。有的版心有刻工。《海豐吳氏詩存》字體秀美，一絲不苟；仿宋刻《陶靖節先生

詩》用仿宋字體，非常精美；《閑閑老人滄水文集》字大方正，悅人眼目；《五種遺規》《據古錄金文》刻印均較精。

清後期的福山王氏刻書有三十八種，以王祖源刻《天壤閣叢書》和王懿榮刻書為主，皆具版本與學術價值。朝鮮金正喜輯《東古文存》，在國內及朝鮮僅有抄本流傳，是稀見之本。《麟角集》在明有祁氏淡生堂抄本，至清又有多種抄本，但刻本僅見於鮑氏《知不足齋叢書》和《王氏彙刻唐人集》，而王氏天壤閣本所據為嘉慶王氏本，又據鮑廷博本補，集二者之菁華，可謂版本精審，有校勘價值。《黃御史集》在宋有二刻，明正德本所據為宋慶元本。在未見正德本的情況下，王懿榮以影宋抄本為底本，以還宋本原貌，缺者以崇禎刻本補。全書刻成後，又發現了正德本，於是附錄部分據正德本補入。其父王祖源自詡“此刻在今日世存黃集中誠第一舊本矣”。牟庭撰《周公年表》一卷，其子牟房已刻於湖州。同治五年，懿榮求得手稿於掖林牟貽家，知為最後定本，據以重刊。漢揚雄撰《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光緒間王懿榮在京師有影宋刻本，影宋刻《方言》，此本最早。刻成後王懿榮感覺影寫不精，故未入《天壤閣叢書》，當時祇印行數十部，流傳稀少。

丁氏號稱是清代黃縣最大的家族，不僅名動膠東，且聲響京城。與其他大族刻書不同，丁氏刻集部書最少，除了《悅軒文鈔》《黃邑弦歌集》《張烈婦傳》《土鄉烈女詩文畧》外，其餘均為經部、史部和子部書。史部為家譜和傳記，經部範圍較廣，可見膠東地區的經學研究與掖縣相呼應，並不遜色於其他地區。而子部主要為善書和醫書，惜祇見記載一種，其他未見流傳。善書和醫書的刊刻可以反映清末膠東地區的刻書風尚。刻書者有丁世任、丁晉祺、丁以約堂、丁純約堂。丁樹楨海隅山館刻王漸鴻的《鄉黨圖考補證》，是清末山東的重要經學著述。

榮成孫氏刻書自孫福海刊刻蓬萊楊廷芝的《鄉黨約說》始。

孫葆田獨嗜經，其書齋皆以“經”為名：“涉經樓”“問經精舍”“授經樓”“校經室”“經潤樓”，故刻書以經書為主，有《漢人經解輯存序目》《漢儒傳經記》《周易本義》《春秋會義》《周易古本》《古文尚書》《孟子音義》《孝經鄭注附音》《孝經章句》《讀易自考錄》等。孫葆田還在刻書中倡導古文，如刊刻《孫明復小集》，刊刻《明文正氣集》《望溪文集補遺》《奉萱草堂文續集》。除此之外，孫葆田還刻了其父的《之遊唾餘錄》《不夜書屋試律偶存》，其弟的《孝經鄭注附音》，其友的《澤雅堂文集》，包括他自己的《鄉試硃卷》《會試硃卷》。孫葆田刻書注重版本，刻《春秋會義》所用的底本來自四庫館所輯《永樂大典》本，《孟子音義》所據的是日照許瀚刻景宋本，《周易古本》是仿臨漳本校勘。

濰縣郭氏在清後期的刻書以郭綏之和郭恩孚為主。郭綏之刻書集中於咸豐十一年至同治八年間，與山東戰事相始終，詩歌的內容反映了當時的戰況。他以刻自己的作品為主，兼刻郭鼎、柯蘅及柯蘅之妻李長霞等友人的著述，計有《銘夏詩鈔》《春雨堂詩選》《錡齋詩集》《餐霞集》《聊復集》《滄江詩集》。郭恩孚與郭祐之合刻郭夢星的《尚書小札》《午窗隨筆》《漢書古字類》，與徐繼儒合刻張昭潛的《無為齋文集》，又刻郭綏之的《滄江精華錄》、張昭潛的《無為齋續集》《山東省沿革表》和自撰的《果園詩鈔》，共刻書八種。其中三種書有“果園刊書第某”的標志，想必有自己的刻書計劃。郭恩孚刻書版式整齊劃一，字體秀美，開本及版式闊大，代表了清末山東濰縣刻書的較高水平。他有專門的刻書人員，如刻工吳培元，參與了《寶樹堂遺書》《滄江精華錄》《無為齋文集》三書的刊刻。

日照丁守存一生刻書十餘種，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自道光二十年至同治二年，刻有《西洋自來火銃製法》《用地雷法》《新火器說》《築寨圖說附事宜》《從軍日記》《造化究源》；第二階段，自

同治三年至同治十年在楚北糧署任上，刻有《曠視山房制藝初二集》《曠視山房制藝二集》《丁心齋時文續》《海曲詩鈔》《曠視山房制藝續集》《四書虛字講義》《竹石山樵六十自壽百韻》《楊忠愍公集》《楊忠愍蛇膽表忠記》《曠視山房大題兩編》；第三階段，自同治十二年北上至光緒初，先是補嘉慶二十五年福山王善塏刊刻的《郭康介公遺集》，繼刻有《科名金針》《編年自記》。

棲霞郝聯薇兄弟刻書二十四種，清中期已述。

利津李氏除了在咸豐刻書三種外，在清後期刻書有十五種，大多為李佐賢的著述。詩文雜著約占二分之一，金石書畫方面的著述占二分之一。著名的金石學著述有《古泉匯》《續泉匯》。亦刊刻地方文獻，如《武定詩續鈔》。刻書地或在北京，或在利津。

曲阜孔氏刻書在清後期遠不及前、中期之盛，僅有孔昭幹、孔昭禮校刻孔昭璽編集的《增補孔庭摘要》，孔憲蘭刻《聖蹟圖》《聖門禮誌》《樂誌》《聖賢像贊》，孔憲奎刻楊岳春的《意為草》。其中，精美者有孔憲蘭刻的《聖蹟圖》，人物生動，線條流暢，是清末版畫的精品。

濟寧孫氏是刻書大族，現存最早的刻本是嘉慶十五年孫善寶為其師高如岱刻的《洸西草堂集》。清後期，孫毓漢刻曾祖孫擴圖的《一松齋集》，刻其父孫玉庭的《延釐堂集》，孫氏刻書還有《光緒庚寅科會試錄》《進士登科錄》，孫玉庭《寄圃老人自記年譜》，孫毓漢《濟寧孫氏列傳》，孫毓汶《遲庵集杜詩》，蔣作錦《東原考古錄》，朱熊光、朱衍坤《鶴唱詩鈔》，孫楫《郭亭詩稿》《郭亭詞集》，共十餘種，多為集部書。

諸城尹彭壽是清末山東著名的金石學家，刻書九種：王懿榮的《漢石存目》，王筠的《說文部首讀補注》，鄔正階的《春暉草堂臚彙》，劉瑞源藏、尹彭壽編的《擬華齋古印譜》，自撰的《周秦魏晉石存目》《山左北朝石存目》《國朝治說文家書目》《國朝治說文家未

刻書目》《石鼓文匯》《漢隸辨體》。所刻一系列金石類書籍，使金石學知識在山東得以傳播、普及，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山東金石學的發展。尹彭壽所刻書大多版心下刻“諸城來山園”，字體方正，相當精美，尤其是《說文部首讀補注》，由其子祚薰寫篆字，每葉四行，每行五字，朱墨套印，不僅便於初學，更富有藝術性，展示了晚清山東刻書的風采。而其《石鼓文匯》，係親手洗拓石鼓文，細審畫底，校得真形，與歷城刻工趙鳳章合作，相當精美，極具藝術價值。

膠州徐宗勉不僅為境遇不好的膠州下層士人刻書，還為婦女刻書，共計十一種，有姬鳳舉《青艾集》《瘦菊軒藏稿》，王齡芝《芝田藏稿》，陳際昌《四癡主人詩鈔》，徐守真《韋每齋詩草》《韋每齋試帖》《對吳試帖》，徐搢《扶青先生誠言》，張兆惠《客邸閒吟》，釋孚一（徐應機）《文字禪》，李胡氏《靡他吟》附《閨秀詩》。

膠州王葆崇刻書重視鄉邦文獻，刻書九種，有其父王六謙的《半是齋詩草》，其兄王大來的《五畝宅園居詩草》《五畝宅村居詩草》《五畝宅山居詩草》《五畝宅詩草前集》《五畝宅碎琴詩草》，還有王紳的《種德堂未焚草》，王服芳的《面城居詩草》，王九成的《石泉先生識言》。有刻書時間，有藏板地——助息園。

昌樂陳汝庚有子三人：陳植、陳枚、陳桀。道光十八年，陳枚刻陳汝庚的《藤花軒詩鈔初集》《續集》；同治間，陳枚刻自撰《小藤花軒詩鈔》《讀史偶筆》；陳植、陳桀刻陳枚撰《琴山詩鈔》；陳桀刻陳枚撰《琴山詩續鈔》；陳植刻自撰《謀稼村詩草》及夫人李氏撰《蘭坡詩草》。陳氏所刻全部為家人詩集。

荷澤馬新貽，官至浙江巡撫，刻書四種。同治六年刻《浙江海運全案重編》，係咸豐同治年間浙江海運漕糧的文件彙編。翻刻內府書三種：《御纂周易折中》《欽定詩經傳說彙纂》《欽定書經傳說彙纂》。馬新貽被刺殺後，弟馬新祐為他刻《遜學齋文集》，馬新